



丛林选贤与剃度袭传：

## 民国时期静安寺住持传继纠纷

◎ 丁希宇

“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使禅宗的传播与发展有了规范的活动场域与可靠的生存基础，促进了佛教进一步的中国化。但法久弊生，十方丛林之下衍生出子孙庙的剃度传继，其弊端显而易见。民国时期上海名刹静安寺围绕住持传继，一场场纠纷不断上演，颇具典型，为我们展示了当时政教以及僧俗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具体面相。下面根据相关史料，如实呈现，对于今人不无启迪作用。

### 一、风波初起：六根被黜与心如继任

晚近以来，上海静安寺围绕住持传继与庙产管辖，剃度派与十方丛林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1915年住持僧正生圆寂后，由剃度派徒孙六根继任新住持。六根继任有违清规，引起十方选贤僧众的强烈不满并策划选举新住持。1922年冬，江苏省境内的龙华寺、留云寺、文殊院等三十余座寺院，公举当地名僧心如（谷云）和尚为新任住持，废除六根的

大和尚资格，并推举仰西为总代表赴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请求立案。<sup>〔1〕</sup>

1923年3月20日，会审公廨俞襄谏与英副领事包克本作出第一次判决，其判决词如下：

查大理院三年上字三三号判例，凡寺院产业由施主捐助者，即为公产，该寺之代表人（住持）对于此种产业，仅有管理之权，不能任意处分。又五年上字二五五号判例，由施主捐助之庙产，纯为宗教公产，其所有权不属于原施主，亦不属于住持，而专属于该寺庙等语。是静安寺财产专属于该寺，所有住持等，但有管理权而无所有权，自不容丝毫有所侵占及任意处分浪费。六根和尚曾于民国六年即西历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被常贵僧等状诉有案。本案原告姚芝庭口供亦称其行为不端被逐等语，是六根和尚已自失其住持资格不应再作住持，并预闻寺中事物，应即将寺内一切对象交代清楚，即日斥退，候函请上海

县公署查照。据仰西和尚代表僧众请求,已由僧众选举心如和尚为该寺住持,既系于公选,应准作为静安寺正住持,着将选举笔录抄呈备查。一面由该正主持心如和尚迅往该寺将寺内一切动产先行接管具报,届时派捕前往弹压,并限于十四日内,再公选副住持和尚一人呈候核夺。各施主着提出每人五千元之捐助证据与逸善堂董事问题,改期十四天一并讯明核办。<sup>[2]</sup>

公堂判决所有静安寺财产统归心如执管,六根不得干涉,并于3月23日派警陪同心如至静安寺实行接受。<sup>[3]</sup>

谕令下达后,“于是与该寺有关系之方面,闻悉此项判断,均不满意”。逸善堂董事姚芝庭即表反对。27日,姚芝庭律师赴会审公廨,申明:按照上海各寺院习惯,住持一席,例系传袭,并无推举之先例,而中华佛教公会更无权干涉。要求公堂将所下判决收回。六根、该寺施主以及代表上海佛教公会的律师,均相继表态支持姚芝庭的控诉。六根律师的发言则极力攻击仰西、心如两僧。

该两僧的代表律师爱理思辩护:仰西之具禀请求,系用各大丛林公举为代表之资格,并非用中华佛教公会会长之资格。如谓公举住持并无先例是又不然,即以常贵而言,其能住持静安寺,亦系由各寺公举,而非师传。<sup>[4]</sup>

会审公廨见一时无从判决,遂决定对于姚芝庭的控诉请求,俟再定期由爱理思律师辩论后再行会商堂谕公布。

为使公众了解本案原委,4月3日,仰西、荣照、印怀等三和尚向申报馆寄发公论一件,详述静安寺更易住持真相。控诉六根在该寺时,“至佛前香火寥寥,青苔满室,香积厨炮猪烹羊,般若堂污气沉沉,僧非僧,俗非俗,僧犯规而俗吞产。”对于林稚周等冒名董事企图侵占庙产坚决反对,“寺院财产,无论人民之布施,或僧徒之募化,此项权利

当然属诸寺院,并住持僧始得管理。无论对于原布施人之产权,存在与否,既布施后,在法律上已经消灭,无回复之地,况其借口及强称董事哉?”(同注<sup>[1]</sup>)

4月11日,再次开堂公审。仰西辩护律师爱理思辩护:当其(心如)为西林寺住持时,因本案被告林稚周与常贵等,藉佛教公会名义,调查该寺财产,勒令心如将方单交出,林等即行抢去,后扭控于警区,区长命林等交还。故心如因林等意图侵占该寺财产,曾一控之于城内审判厅,又控之于大理院,现该案尚在省长公署未了。是心如屡次与人涉讼,实皆为保管寺产而起。而六根等反对方面的律师依旧攻击对方之短处,会审公廨为慎重起见依旧将此案再审判决。<sup>[5]</sup>

与此同时,上海佛教公会会董姚文栋<sup>[6]</sup>、议董曹骧、顾藩等呈文内务部、江苏军民两长、护军使、道尹、交涉署、上海县知事,声称:静安寺载在《大清一统志》,为著名千年古刹。其住持六根是前住持僧正生徒孙,民国四年依照剃度法派习惯继承接管,与大总统公布的修正官吏寺庙条例并无不合,且该僧继任以来并无不守教规及违背管理义务各种情节。3月间会审公廨骤然撤换住持并以非同派的心如承继,系属违反习惯,与例不符。并恳请县知事迅速咨询会审公廨更正,撤销原判,继续由法派徒孙继承<sup>[7]</sup>。江苏军民两长接呈后于19日发布批示,对于会审公廨将该寺住持撤换要求上海县知事确切查实以凭核办。<sup>[8]</sup>

各方经过连日的申辩呈诉,会审公廨作出终审判决:

查本案三月二十日之堂谕,系因静安寺住持问题予以核准,为司法行政手续,非诉讼事件,原无辩论之必要,仰西和尚被诉之案,当经注销,于资格上不生问题。心如和尚历充杭州广化、苏州虎阜等寺住持,为各寺众所公选,非佛教公会所推举。虽因庙产攻讦林稚周成立侮辱行为,乃系

因公获谴,与六根和尚品行不端被诉自愿退让住持者截然不同,其大和尚资格不能以此有所动摇。管理寺庙财产不容丝毫侵占,有义务而无权利。本公堂为寺庙责人,但求能显公益,尤无沙门禅门之可分。该原告姚芝庭速追寺产,原为保全公益,对于此次堂谕自不应发生异议。而本公堂令各施主提出五千元之捐助证据实为慎重起见,各施主之捐助目的,既无变更,对于选充住持亦无争持之理由。故三月二十日之堂谕未便收回,惟副住持为管理寺庙条理所无,应免选举,准以心如和尚为该寺住持,选举笔录存卷。所有该寺不动产之单契,应暂由本廨检查员保管,出予收据一纸,交该住持心如和尚收执,并由本公堂分函上海县公署、会丈局及该寺挂号之西人查照注册。该寺产用不得抵押变卖过户,其经租事宜仍由该寺住持延请律师办理,收得租金按月交与该住持入账,并着该住持将该寺每年用度制成预算表呈候核夺,于每年年终,再将收支账目报告。如有特别开支,必须本廨核准,不得专擅,所有收得租金,均须存放殷实银行生息,核实开支,该寺一切事实,责成该住持积极整顿。至逸善堂董事,法律上本无地位,既习惯相沿,应仍其旧,惟只准姚芝庭一人,并不得干涉住持权限,仅于公益事项,备住持之咨询。此次诉林稚周案,仍予进行。如追得款项,除律师费外,交付该住持收管,以后关于该寺为主体之诉讼,应由住持办理,该董事不得越俎代谋。<sup>[9]</sup>

会审公廨的最终判决似乎有意平衡双方的意见。判决心如为新任住持符合十方丛林的要求,允许姚芝庭为寺院董事以减轻反对派的压力,但又规定“不得干涉住持权限,仅于公益事项,备住持之咨询”,这显然与庙首捐资兴庙以得利的习惯大相径庭<sup>[10]</sup>。而对于林稚周案的另案讯办,则在于彰显保护庙产的用意,自然得到双方的认可。但从最终的

判决效果来看,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剃度派对于此种判决结果坚决不服,后来双方围绕住持传继与庙产管理而产生的纠葛依旧不断上演。

## 二、风波再起:志汶的捐资助军

1926年12月,谷云和尚辞去住持一席,诸山公举高旻寺首座法一和尚为新任住持<sup>[11]</sup>。为确保寺庙为十方丛林并不受剃度法派与劣绅的干扰,谷云辞职时,对于后任住持和静安寺十方丛林检查委员会分别制订了二十六条和十八条应守条件<sup>[12]</sup>。对此,剃度派徒孙志汶再次表示反对。

五卅案起,民愤激发,中国乘此时机将会审公廨收回并设临时法院以作过渡。此时志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起控诉,称静安寺古制即为法派袭传,但在1923年被前会审公廨判归了十方丛林,要求重新改为剃度派。为防止丛林派再起控诉,志汶未经上海特别市政府批示,径直向江苏省民政厅提出愿意捐助军饷10万元,希望省民政厅承认其法派的住持资格,并要求派员向临时法院索取前住持心如任内暂存在前会审公廨监察处的财产契据。但其私下却盗卖寺产达20万之多。时北伐军兴,需款亟亟。省民政厅未经核实,即批准志汶的请求。此议甫起,反对之声纷至沓来。

得知志汶的企图后,上海诸山代表立即呈文国民政府外交部、司法部、江苏省政治会议委员会以及江苏省民政厅,并向临时法院另行起诉。

上海佛教会也立即呈文上海特别市政府,道明原委。对于民政厅违法处理表示“实难甘服”,并提醒上海特别市政府,临时法院的判决既然与收回会审公廨换文相反,民政厅的主张又与市政府条例相违。因此,要求市政府依法主持,令临时法院追回其券,扣押各据,并布告禁止售卖。<sup>[13]</sup>

市政府接呈后,即刻表态彻查<sup>[14]</sup>。11月7日,张定璠市长呈文军委会,请示待该寺住持问题依法解



决后,再由市政府负责监督,责成该寺合法住持将所认军饷,设法筹出,汇交军委会,并希望军委会派员赴沪会同办理<sup>[15]</sup>。军委会复电称:“准如所拟办理,候即派员会同民政厅特派员公开处分”<sup>[16]</sup>。另一方面,市府又急电江苏省民政厅,望其迅派专员来沪会同军委会委员公开处理。<sup>[17]</sup>

江苏省民政厅认为,志汶以嫡系僧徒继承住持,与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相合,此案属行政处分。并认定租界内寺庙,非关涉民刑事件,该法院无权干涉,该寺财产,应依条例,由地方官注册。省府方面将民政厅远呈提交第三十七次政务会议议决,交由省民政厅办理,并派委员项康元、孔庆璋赴沪清理该寺产业。<sup>[18]</sup>

此前,市政府为积极清理静安寺产,拟请上海佛教会、上海总商会、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及江苏民政厅所派赴沪委员组织上海静安寺产清理委员会,并起草了章程十条<sup>[19]</sup>。1928年5月9日,元照、仰西二僧所聘律师,再次向临时法院提起诉讼。论证龙华寺与静安寺皆建自三国时东吴赤乌年间,前者既系丛林,后者自当亦系丛林,并有《释氏稽古录》一书可以为证。而志汶则坚称该寺自始迄今,均系剃度派,有世系表及历代住持之栗主可以为凭。庭长钟洪声鉴于争论双方各执一词,而省市两政府亦观察不同,遂谕改期听候核办。<sup>[20]</sup>

上海市府方面认为非有详细法规,不足以资依据,于是特呈中央政治会议,请示北京政府原定《修正管理寺庙条理》是否仍然适用,中央会议议决交由司法部议决。与此同时,市府主张设立清理静安寺产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完全由市府核准执行。而省民政厅则认为,就行政系统而言,上海租界属于省政府范围以内,不必另组由市府主管的清查委员会。

为解决省市权限之争,1928年1月,财政部议决该案交由财政部处分,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三条:

①该寺应予保留;②寺外房屋由财政部分别押卖,以10万元拨充军饷,其余悉数购买二五库券;③所购库券,悉交省政府或其指定机关,作为研究学术、宗教等基金之用。由财政部聘任省市两政府及各方代表于驻沪办事处组设寺产处分委员会。但省府对此不表赞同,财政部所拟办法亦无见效。

七、八月间,北伐告成,筹济军需,情势稍变。此案复杂程度用宋子文话说:“本案以行政牵及司法,兼合宗教及租界问题,而省市两级政府,又有权限之争,中经僧志汶空言助饷,复涉军政范围。恍恍迷离,动多枝蔓。”静安寺一案非先解决法律问题,以完程序,别无他方。因此,财政部呈文国民政府飭下司法部办理<sup>[21]</sup>。黄绍竑莅任内政部长后,为谋彻底解决之方,于1933年9月,会同财政、外交两部迭派大员,实地调查,并提出最终解决办法三条呈行行政院批示:①管辖权限隶属范围。依据监督寺庙条例的规定,所谓主管官署当然为上海市政府;②住持派别问题。查该寺为十方丛林,载在典籍,虽中经“洪杨之乱”一度变为剃度私传制度,但自民十一以来即以回复丛林之制,并先后呈报前上海会审公廨、上海政治分会及上海市政府各在案,自应予以维持,永定为十方丛林,并由该寺勒碑门前,永垂久远;③寺产处分问题。查动用寺庙财产,应遵照《监督寺庙条例》办理,从前志汶所呈请出卖寺产捐饷助军,纯为假公济私。民厅因受蒙蔽,姑无论合同内容如何,终属欺诈行为,且其交价过割,以转换道契为条件,现在该道契既未转出,则条件并未成立,自无法律效力可言,应一律予以取消,所有该寺财产及法物,即由上海市政府督饬所选住持,切实办理,照章呈请登记,嗣后不得擅自处分或变更。

行政院批复:该部既对于管辖权限、住持派别、寺产处分,均拟有相当办法,本部自亦赞同等情,本案该部所拟解决办法,应准照办<sup>[22]</sup>。北伐军控制

上海后,鉴于上海的重要性,决定将上海辟为“特别市”。1927年5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通过《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决定设上海特别市,地位与省相等。7月4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11次会议,修正通过了《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再次强调上海特别市直隶于中央政府,不入省县范围<sup>[23]</sup>。按此规定则省厅方面显有越权之嫌。

此案之中,丛林派与剃度派围绕住持继承的合法性问题争论不已;而江苏省民政厅与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权限之争则喋喋不休;捐资助饷,军委会又牵涉其中;又由于私产抵押问题与英商有染,又关涉外交纠纷。内政部的“最终解决方案”并未最终解决静安寺产纠纷。丛林派住持虽得法律认可,但剃度派的“住持争夺战”并未因此而停息。

### 三、风波余续:持松法师的继任

志汶病故后,由其徒德悟继任住持。在其任职期间不乏丛林派的反对,并有短暂的牢狱之灾<sup>[24]</sup>,后得以复职。1947年3月24日,德悟函请方孝庵、奚亚夫二律师代表致函佛教会,自愿将该寺改为十方丛林。佛教会以改制选贤之举既出自该寺住持德悟及全体僧众的要求,又,市政度法令也曾命令该寺为十方丛林,佛教会遂于3月29日,在该寺召集诸山长老、护法居士及静安寺全体僧众,举行会议。一致议决该寺为十方丛林,并公推持松法师为改制后的首任住持,并得市府备案保护<sup>[25]</sup>。但六根对此极为不满,并在报上刊登启事,企图推翻公议。11月23日晚,六根束邀沪上各报记者于福州路京华酒家,宣称要回任静安寺住持,整顿教规,清理寺产<sup>[26]</sup>。于是遂有《静安寺僧六根为僧持松非法霸占事质吴市长并呼援》(申报,1948年6月20日)、《上海佛教剃度派全体寺院吁请潘徐参议长暨参议会诸公对于静安寺非法改制主持正义》(申报,1948年6月21日)、《静安寺各商店为该寺非法改制请

参议会干预公启》(申报,1948年6月22日)、《静安寺护法施主四千余人反对客僧持松恃符霸占请求市参议会诸公及舆论制裁》(申报,1948年6月23日)、《静安寺门徒‘俗称施主’四千余户驳斥伪住持代表之荒谬启事》(申报,1948年7月12日)等公启相继见诸报端,无一不是攻击改制非法,住持应由徒孙继任。但此次改制系由剃度派住持德悟倡议,又有判例存档,六根回任住持的企图未果。

持松法师继任静安寺住持后,为佛教复兴作了不懈努力。1948年静安寺佛教学院创办《学僧天地》月刊,持松任名誉会长。1953年4月在寺内设立真言宗坛场,复兴久已失传的唐代密教;1954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6年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1964年参加新编《辞海》中有关佛教条目的编纂工作;同年7月,法师随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1965年3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1972年11月6日,圆寂于上海,终年78岁。持松法师懂日文、梵文,善诗词,兼工书法,留世著作有26种之多<sup>[27]</sup>,难怪时人称其是“学者型法师”。<sup>[28]</sup>

### 四、余 论

美国学者霍姆斯·维兹(Holmes Welch)经过调查研究,对子孙庙与十方丛林作了细致区别。他还指出,除了子孙庙与十方丛林这两种性质迥别的佛教寺院外,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被称作“子孙十方丛林”的寺院存在,而且它们可能远比正统的纯粹丛林普遍,这种寺院同时兼具丛林与子孙庙的特点。一方面寺院住有四五十位和尚及大批一期一任的主管人员,云水僧可无限期止留,有的还定期举办禅修或念佛活动;另一方面,它们又为沙弥剃度并给予受戒前的训练,寺院的管理权完全由一个剃度家控制。<sup>[29]</sup>

从维兹的以上判断来说,民国以来的静安寺更多地呈现出“子孙十方丛林”的特点。就本文所及范围,民国以来的数位住持,正生、琴芳、谷云、法一、持松诸法师为十方选贤,而六根、常贵、志汶、志法、德悟等则为剃度传继。按丛林派说法,有些剃度派住持继任并非因其为剃度派,而是因为该僧确实符合十方丛林的选贤标准。即便在剃度派住持寺院时,监院、护法等职衔则由丛林派担任。

民国时期静安寺的“住持争夺战”可谓“乱花渐欲”,佛教传统、政府法令以及民间习惯相互交融,其中庙产管理是各方争夺的核心,民初太虚大师提出的“集产主义”口号便引起巨大的争辩。袭传与选贤都是以管理庙产为旨归;士绅参与其中则展现了基层势力的一个侧面;而政府政策则在冲突中加以调适。静安寺个案为我们展示了民国时期政教以及僧俗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具体面相。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 【注 释】

- [1]《静安寺更易住持真相》,《申报》1923年4月4日。
- [2]《第一次判词》,《海潮音》第四年第十一期,载《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57卷,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
- [3]《静安寺住持已定》,《申报》1923年3月24日。
- [4]《静安寺住持争执未已》,《申报》1923年3月28日。
- [5]《争夺静安寺住持之辩论》,《申报》1923年4月12日。
- [6]1912年姚文栋曾于以故僧常贵将寺产积余资金增建三圣殿。上海通讯社:《上海资料研究正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第225页。
- [7]《静安寺住持之再争》,《申报》1923年4月16日。
- [8]《静安寺住持问题之两会长会批》,《申报》1923年4月20日。
- [9]《第二次判词》,《海潮音》第四年第十一期,载《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57卷,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
- [10]梁勇:《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的权势转移》,《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 [11]《静安寺方丈交替》,《申报》1927年4月27日。

- [12]《谷云通告》,《申报》1927年4月28日。
- [13]《上海佛教会呈上海特别市政府文》,《申报》1927年12月8日。
- [14]《静安寺产争执案续讯》,《申报》1927年11月1日。
- [15]《张市长对于静安寺产之主张》,《申报》1927年11月8日。
- [16]《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申报》1927年12月8日。
- [17]《张市长致江苏民政厅电》,《申报》1927年12月8日。
- [18]《静安寺产业纠葛案》,《申报》1928年8月7日。
- [19]《市政府组织清理静安寺产委员会》,《申报》1927年12月7日。
- [20]《呜呼静安寺》,《申报》1928年5月20日。
- [21]《静安寺产业纠葛案》,《申报》1928年8月7日。
- [22]《静安寺产权解决办法》,《申报》1933年9月14日。
- [23]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秘书处:《上海特别市政府法规汇编》初集卷上,《总务类》附录。转引自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504页。
- [24]详见:《申报》,《静安寺佛像误传盗卖》(1943年8月22日)、《静安寺护法陶希泉、李思浩、陈彬龢申明》(1943年11月2日)、《静安寺住持德悟启事》(1943年11月5日)、《静安寺处分佛像彻查经过》(1943年11月6日)、《德悟密迦下狱后太虚住持静安寺》(1946年9月30日)。
- [25]《上海静安寺十方丛林改制之经过》,《学僧天地》第一卷第二期,载《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56卷,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
- [26]《静安寺多事,寺产闹纠纷》,申报,1947年11月26日。
- [27]游有维:《持松法师生平事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宗教组编:《名僧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 [28]《沪静安寺新任住持持松法师是位学者》,《申报》1947年4月7日。
- [29]霍姆斯·维兹(Holmes Welch)著,包可华、阿含译:《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上),载《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202-203页。